

湖北省贫困山区人口迁移初析

钟水映 叶北笏

人口的迁移，决不仅仅是表象上的人口在不同地域间的流动这一纯粹性的人口问题，它是社会经济发展诸多方面因素在人口的地区间分布变化上的综合反映。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口迁移既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指示器”，也是其“推进器”，是社会进步的象征，英国学者列文斯廷谈到人口迁移时有一句名言：迁移意味着生存和进步，一个静止的人口只会停滞不前。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经济愈发达，人口迁移现象就愈普遍。就我国目前的整体情况而言，尽管人口迁移的程度还较低，但却呈现出明显的梯度差异：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人口迁移率较高，内地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口迁移率较低，人口的迁移率高低与社会经济发展呈极强的正相关关系。从湖北省的情况来看，各地人口迁移率也参差不齐。本文的着眼点集中于探讨湖北省贫困山区的人口迁移问题，主要分析其现状及形成原因。

本文的贫困山区，指的是湖北省70个县及县级市中的低收入地区。按1989年湖北省各县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高低，我们把70个县市分成低收入县市、中等收入县市和高收入县市。其中低收入县市共有23个，它们包括湖北省的13个国家级贫困县和一部分湖北省省级贫困县。此外，这23个县市且都处于山区，于是本文称之为贫困山区。本文所有

关于人口迁移的资料来源于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有关县市的手工汇总和10%抽样资料。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中界定的人口迁移，既包括户口状况发生了变更的迁移者，也包括“常住本县市一年以上，户口在外县市的人口”和“人住本县市不满一年，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人口”这几类迁移者。严格而言，后面两类户口状况未发生变更的人口与前面户口状况已变更的人口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不能简单地混同为“迁移人口”。我们可以把户口未变迁的这两类人口称为“暂时性迁移人口”，而把户口状况已经变迁了的人口称之为“永久性迁移人口”。之所以作这种区分，是因为“永久性迁移人口”大多属工作调动、分配录用之类人口，很大程度上受国家指令性计划干预，迁移后一般不再返回迁出地；而“暂时性迁移人口”则受市场调节影响较大，迁出后仍有可能返回迁出地。根据我国迁移人口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农村人口迁移的特点，我们称“暂时性迁移人口”为“流动人口”，这一部分人正是符合一些人口迁移理论所论述的迁移者的特征，也是我们兴趣的集中点。本文的分析重点也在于这类“流动人口”，它是人口普查资料中迁移人口的一部分，其口径较迁移人口窄些。

二

(1) 人口的迁入

基于前面所述理由，我们分析贫困山区的人口迁入也只是重点地分析迁入人口中的流入人口部分。

贫困山区的人口流入是指人口从本县市所辖地外流进本县市所辖地。人口在不同地区间的流动，是流入地对其产生的吸引力（我们称之为拉力）和流出地对其产生的排斥力（我们称之为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拉力和推力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而导致居民收入的差异、不同地区间的生活质量的高低和生存环境的好坏、社会福利等保障措施的完善与否等等，都有可能导 致人口在不同地区间流动。就人口流入而言，如果某地经济收入较高，或是生活环境条件较为优越，或是社会福利等保障措施较为完善等等，必然使得一部分人觉得迁到此地生活比原居住地更有吸引力。只要从原居住地迁到某地的成本在其可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那么某地就很可能吸引较多的人口流入。相反，如果其各方面的条件较差，其吸引力就弱，流入的人口就会寥寥无几了。表1是湖北省部分地区人口流动的有关数据。

就表1的流入率（流入人口/常住人口×1000‰）来看，全省范围内存在着明显的梯度差异，贫困山区的人口流入率较其它地

区低。从收入分类看，低收入地区的人口流入率分别比中等收入地区和高收入地区低5.94和8.2个千分点，比各縣市平均水平低4.73个千分点；从地形分类来看，山区人口流入率分别比丘陵地区和平原地区低1.65和2.29个千分点，比各縣市平均水平也低0.96个千分点。特别突出的是，人口流入率较高的县市与较低的县市之间的差距极大。人口流入率比较高的几个县市是：汉阳县（28.59‰）、蒲圻市（23.02‰）、江陵县（26.43‰）、较低的几个县市是建始县（1.31‰）、麻城市（1.40‰）、蕲春县（1.52‰）、英山县（1.80‰）、大悟县（1.83‰）。汉阳县的人口流入率是麻城市的20倍之多。

形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不同类型的地区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强弱不同的缘故。几个较发达的县市，或是大城市郊县（如汉阳），或是地处发达的江汉平原（如江陵），或是交通便利、工业基础雄厚（如蒲圻），这些条件都大大增强了其吸引力。相反，人口流动率最低的几个县或是国家级贫困县（如麻城、英山、大悟），或是地处鄂西、鄂东的山区县（建始、蕲春），这些县市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很弱。一般而言，贫困山区收入普遍偏低，使得人口流入最重要

表1 湖北省国家级贫困县人口流动情况（‰）

地 区	流 入 率 ①	流 出 率 ②	总流动率 ③=①+②	净流动率 ④=①-②
A 按收入分：				
低收入地区	3.01	5.66	8.67	-2.65
中等收入地区	8.95	8.04	17.00	0.91
高收入地区	11.21	10.77	21.99	0.44
B 按地形分：				
山 区	6.78	6.48	13.26	0.30
丘 陵	8.43	9.45	17.88	-1.02
平 原	9.07	10.35	19.42	-1.28
C 各縣市平均	7.74	8.16	15.90	-0.42

的动因较难产生。此外, 贫困山区生活条件艰苦、环境险恶, 无论从物质生活方面还是精神生活方面, 对流动人口的拉力都往往不及发达地区和丘陵平原地区。据武汉大学人口研究所在湖北省所作“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一系列调查结果, 湖北省人口流动的原因, 拉力是占主导地位的。在农村, 人口流动有56.6%是由于拉力作用的结果, 在镇里, 这个比例为57.0%。贫困山区的拉力弱, 使得人口流动过程中起主导因素的动因难以发挥作用, 于是, 这些地区人口流入率就很低了。

即使在人口流入率普遍较低的贫困山区内部, 我们仍可透过人口流入率的差异, 看出不同的县市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又有所不同。比如丹江口市的人口流入率高达23.83%, 这是因为该市尽管地处山区, 收入也不很高, 却不乏吸引流动人口之处: 该市有丹江口水库及电站, 还有一大批工业企业, 交通也较为便利, 山区资源开发利用条件较为优越。另一个例子就是湖北省级贫困县秭归县, 其人口流入率达9.36%, 高于同类型的贫困山区平均水平, 也高于全省各县市平均水平, 甚至比有些高收入的平原县市还高。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秭归县处长江沿岸, 拥有便于交通运输的黄金水道, 且靠近宜昌市这一地区经济中心, 能接受到较强的辐射。这种优越的地理条件增强了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贫困山区尽管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较弱, 但并不排斥一部分流动人口流向这一地区。这是因为, 从表面来看, 流向高收入地区和平原、丘陵地区无疑比流向低收入地区和山区更具有吸引力, 但这仅是从一般的趋势和正常的情况看问题。现实生活往往复杂多样, 常常出现这样的情景: 在对流动人口吸引力较强的地区, 往往竞争也较为激烈, 而吸引力稍差的地区

则每每被人忽视, 形成了“真空区”, 这里的居民商品经济观念较为淡薄, 竞争较为缓和或根本无人竞争, 加之贫困山区往往拥有一些特有的资源优势, 形成了对流动人口有一定吸引力的比较优势, 在这种条件下, 一些独具慧眼的人往往选择的流向是贫困山区。

(2) 人口的迁出

人口的迁出是指本县市常住人口向所辖地域外迁出现象。同样, 这里分析贫困山区的人口迁出, 也只是分析其中的流动人口中向外流出的人口。

人口的流出, 除了流入地的吸引力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由于流出地对其人口的排斥力的作用。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收入水平较低、生活条件艰苦、居住环境险恶、社会福利等保障措施不够完善, 贫困地区不仅对外地人口流入本地的吸引力较弱, 而且也产生了较强的对本地人口外流起推动作用的排斥力。

从表1中, 我们可以看到各地人口流出率(流出人口/常住人口 $\times 1000\%$)的情况。从表中数据可知, 从收入分类来看, 低收入地区的人口流出率比中等收入地区低2.38个百分点, 比高收入地区低5.11个百分点, 比各县市平均水平低2.5个百分点; 按地形分类来看, 山区比丘陵地区的人口流出率低2.92个百分点, 比平原地区低3.87个百分点, 比平均水平也低1.68个百分点; 就流出率高低的两极典型来看, 最高的是几个城市的郊县, 如汉阳(35.31%)、黄陂(37.24%)、宜昌(21.02%)、武昌(19.24%), 最低的是鄂西和鄂东南的几个山区低收入县, 如来凤(1.99%)、咸丰(2.11%)、鹤峰(2.63%)、通山(2.03%)、崇阳(3.06%)。最高的黄陂县是最低的来凤县的18倍多。

仅从推拉理论表面来看, 贫困山区似乎对流动人口拉力不足, 推力有余, 有较高的

人口流出率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事实上,影响人口流出是不同的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据武汉大学“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的有关调查结果表明,湖北省人口流动的原因中,出自推力的部分居于较次要的地位。在农村,由于推力作用而形成的流动占34.2%;在镇里,这个比例为33.9%。而且,从潜在的拉力和推力到现实的人口流动之间仍有许多中间环节,深入分析这些环节,才可能解释表1中贫困山区人口流出率较低的现象。

E·S李就曾分析影响人口迁移活动的诸多因素。他把它们划为四类:一类是由于出发地的原因,二类是出于目的地的原因,三类是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的障碍因素,四类则是迁移者个人的因素。如果我们粗略地把前两类因素归之于推力和拉力的范围之内的话,那么影响贫困山区人口流出的原因还应从后面两者进行分析。就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的障碍问题而言,主要是交通是否便利,信息是否灵通等。贫困山区一般处于崇山峻岭之中,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人口流出的自然障碍因素较多。相对于贫困山区的微薄收入来说,高昂的流出成本使得他们往往望而却步,尽管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他们也只有无奈的叹息。除了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的障碍因素外,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还在于贫困山区居民个人因素不适宜于流出,当然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在发达地区,劳动者受商品经济熏陶机会较多,观念的变更相对快一些,外出务工经商等流出活动司空见惯,形成了一种追求较高经济收入而外出奔波的风气。反观贫困山区,多数人商品经济观念淡薄,信奉纯朴的“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教条,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甚至于把少数外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视为“不务正业”,这种状况使得贫困山区居民们往往形成一种惰性,宁可受穷,也懒得外出奔波,安于脚下方寸地,颇有点“君子固穷”的遗

风。在如此社会背景之下,贫困山区的人口流出率自然很低了。此外,贫困山区居民的个人素质往往比发达地区居民要差一些,在平等竞争条件下,必然处于不利地位,这也客观上抑制了贫困山区人口的流出。

仅就普遍存在的低水平人口流出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贫困山区内部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仍以秭归为例,其人口流出率高达15.08%,不仅在贫困山区中十分突出,而且也高于高收入地区和平原地区的平均水平,这同样是由于前述的地理条件优势造成的。另一个例子是鄂西北的郧县人口流出率达17.75%,这无疑与它毗邻十堰市这一工业中心有关。

(3) 人口迁移的总体现状

人口迁移的总体状况可以从表1中的总流动率(为流入率和流出率之和)和净流动率(为流入率与流出率之差)中反映出来。表中的数据明确地显示,不同类型地区间人口总流动率差异很大。从收入分类看,低收入地区比中等收入地区差8.33个千分点,比高收入地区低13.22个千分点,比平均水平低7.23个千分点;从地形分类来看,山区分别比丘陵和平原地区低4.62和6.16个千分点,比平均水平也低2.64个千分点。两种分类的结果相似,都说明,贫困山区人口流动率既大大低于发达地区,也低于全省各县市平均水平,这是贫困山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反映。如果我们注意一下人口总流动率最高与最低的两极,我们就会发现,几个发达的武汉市郊县,如汉阳、武昌、黄陂及宜昌县最高,分别为63.89%、37.21%、42.00%、38.65%,而几个贫困山区县最低,如建始(4.49%)、宣恩(5.31%)、咸丰(5.07%)、崇阳(5.02%),最高者为最低者的10多倍。

我们再从人口净流动率看贫困山区的人口流动现状。表2是十三个国家级贫困县的

人口流动资料。

表2 湖北省部分地区人口流动情况

		单位 %		
地 区	流入率	流出率	净流动率	
麻 城	1.40	8.08	-6.68	
红 安	2.07	18.10	-16.03	
罗 田	2.74	5.21	-2.47	
英 山	1.81	6.83	-5.02	
大 悟	1.80	10.15	-8.03	
郧 县	7.02	17.75	-10.73	
鹤 峰	5.39	2.64	2.75	
郧 西	1.87	5.60	-3.73	
房 县	2.04	3.30	-1.26	
利 川	2.44	4.20	-1.76	
巴 东	2.94	4.77	-1.83	
宣 恩	2.01	3.30	-1.29	
咸 丰	2.95	2.12	0.83	
全省各县市平均	7.74	8.16	-0.42	

由于净流动率是流入率与流出率的综合结果，我们不能单凭其绝对数值高低来说明问题。例如汉阳、武昌等县流入率和流出率都高，其净流动率绝对值就较低了。但是，我们仍可通过净流动率这一指标认识贫困山区人口流动的总趋势。表2表明，从总体来看，可以说，贫困山区存在着人口外流的特点，全部13个贫困县中，有11个是净流出，另外两个县（咸丰和鹤峰）的净流入率

也极低。资料表明，这两个县的总流动率较低（分别为5.07%和8.03%），而且由于较为闭塞，人口流出率也名列全省最低县市之列（分别为2.11%和2.63%），故而净流动率略呈正值。由此可见，贫困山区的人口流动现状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成两点，一是流动率很低，二是普遍呈外流趋势。

三

人口迁移的现象背后，是各种各样的迁移原因。按照第四次人口普查的统一口径，人口迁移的原因可以分为：工作调动、分配录用、学习培训、投亲靠友、务工经商、随亲迁入、婚姻迁入和其它等原因。根据我国农村人口迁移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把“其它”之外的原因分为两类，一类属计划调节部分，包括工作调动、分配录用、学习培训、退休退职、随亲迁入等，另一类是属市场调节部分，包括务工经商、婚姻迁入和投亲靠友等。计划调节型迁移人口大多受国家行政性计划干预，而市场调节型迁移人口几乎完全受市场调节，如务工经商者受劳动市场调节，婚姻迁入人口受婚姻市场调节。因此，我们分析的落脚点也放在这一部分市场调节的迁移人口上。

一般而言，商品经济愈是发达，务工经

表3 湖北省部分地区人口迁移原因(%)

	计划调节	市 场 调 节				其 它
		总 计	婚姻迁入	务工经商	投亲靠友	
A 按收入分						
低收入地区	32.55	57.46	43.11	8.55	5.80	9.99
中等收入地区	35.81	50.64	31.54	11.81	7.30	13.55
高收入地区	31.33	54.48	28.54	18.19	7.76	14.18
B 按地形分						
山 区	33.35	56.63	40.40	9.54	6.69	10.02
丘 陵	37.33	46.78	26.31	13.02	7.45	15.89
平 原	28.00	57.82	30.98	20.29	6.55	14.18
C 各县市平均	45.93	54.07	34.35	12.84	6.88	12.59

商的流动人口就会愈多，他们在总迁移人口中的比重也愈高，上表正好说明了这种趋势。低收入地区务工经商者比重比中等收入地区低3.26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地区低9.64个百分点，比平均水平低4.29个百分点。山区的务工经商者比重比丘陵地区低3.48个百分点，比平原地区低10.75个百分点，比平均水平低3.3个百分点。各县市中，务工经商者比重最高的是汉阳（46.88%）、公安（38.57%）、京山（37.05%）、汉川（28.01%）和安陆（26.45%），最低的是建始（0.81%）、宣恩（0.46%）、郧西（0.85%）、竹山（1.63%）。前者或是大都市临县，或地处发达的江汉平原，或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和方便的交通，为务工经商者提供了较优越条件，而后者处于鄂西山区，条件很差，务工经商者比重极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市场调节型迁移人口中另一重要部分是因婚姻关系而迁入的人口。表3的数据表明，婚姻迁入人口比重呈“V”型分布：低

收入地区分别比中等收入地区和高收入地区高11.57和14.57个百分点，比平均水平高6.05个百分点；山区比丘陵和平原地分别高14.09和9.42个百分点，比平均水平高6.05个百分点。婚姻迁入人口比重最低的是几个经济发达的县市，如汉阳（12.56%）、当阳（15.22%）、武昌（19.29%）、随州（17.23%），最高的是建始（82.11%）、宣恩（76.53%）、通城（68.75%）、鹤峰（66.67%）。发达地区由于经济收入较高，其它各方面的条件也较为优越，吸引的婚姻迁入者从数量上比低收入地区要多，但由于其迁移人口中因非婚姻原因而迁入的人口也较多，且大大高于低收入地区，所以，从总体来看，高收入地区婚姻迁入者比重反而较低，这反映了其迁移人口迁入原因的多样化，相反，贫困山区尽管婚姻迁入人口数量不多，但比重很高，这也反映了其人口迁入原因的单调性。

（责任编辑：王冰）

（上接第35页）发性移民，即将受淹地区的移民赔偿，变为扶植该区兴办各种安置性的工厂、农场。从试点工作看，效果甚佳，曾得到世界银行的肯定。抓住这一契机，将能从根本上改变秭归的贫困面貌。

人口迁移，作为人类自身的历史过程，能够促进生产力水平与人类自身历史过程平衡运动，具有加快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科技进步，提高人口素质等多种社会功能。人

口的迁移和流动将随着经济的开放日趋扩大，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在这种形势下，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因势利导，从秭归的实际出发，根据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自觉利用人口迁移的积极作用，实现秭归人口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化，对于秭归早日摆脱贫困，实现社会经济良性循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 王冰）